

大陆 深度

旧物中的新世界：我们在“捡破烂”里寻求什么？

在所有的故事里，我们都在通过旧物建立起新的连接，与自我、与他者、与世界。



2007年11月，中国北京，小贩在潘家园跳蚤市场买卖旧物。摄：Claro Cortes IV/Reuters/达志影像

特约撰稿人 程舟 发自苏州 | 2023-01-26

旧货市场 循环经济 stooping

二郎巷与十全街的东段相接，巷子两边是一排排五层小楼，两个抽屉坏掉的床头柜被扔在一栋楼前的草坪

上，拍一张照片，附上位置信息，发到我刚创建不久的小红书账号“Stooping苏州”上，这是账号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stooping内容。

我是偶然刷到小红书账号“Mikiko在上海”才知道了stooping。Stooping在2019年由美国instagrm上的“Stoopingnyc”发起，今年6月，“Mikiko在上海”的创建者波妞最早把这个概念引入中国。Stooping指的是在街头发现有价值的遗弃物，分享出位置信息，让有需要的人带走。我喜欢称此为“捡破烂”。

Stooping发起、聚集的多是年轻人，“捡破烂”的年轻人带着微妙的反差感，作为爱好旧物的记者，他给我带来兴趣与新闻点的双重吸引力。当我接触到这些鲜活有趣的发起者、践行者，他们有契合的理念，有不同的故事，关于循环理念、旧物审美、生活方式，当然还有行动。决定打入内部就在一念之间，理念契合、情感触动、突然上线的行动力，以上皆有。我的故事不多，也不典型，只是最平平无奇的一分子，重要的是我成为那一分子。

捡不捡得到，捡到什么都得随缘

创建“stooping苏州”的第一周，我在自己住处周边晃了两次，一次比一次范围大，紧盯路边的垃圾桶和没人注意的角落。但我什么也没捡到。

创号信息发在微信朋友圈时，一个上海的朋友留言：“我想不通为啥我从来没有在上海的马路上看到过沙发。”在哪里能捡到这类“宝贝”？我其实也很想知道。

武楷斯大概是我认识最有“捡破烂”经验的人。他是小红书账号“Stooping广州”和“Stooping深圳”的创立者，但在知道Stooping之前我已经关注到他，因为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专职做旧物生意的年轻人。2016年大学毕业，他就在广州开了专门的旧物商店，以此为事业已经7年。

写下这段时，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视频，在一个垃圾桶旁他捡到了品牌皮鞋、棉被、两个补光灯，还有一个网红大玩偶。视频里的他很兴奋，我羡慕得很。





武楷斯在收破烂。图：作者提供

武楷斯收旧货的足迹遍布旧货市场、人家、拆迁后的废墟，“捡”是其中之一。他曾玩笑般说“要给眼睛上一个保险。”走在街上，他会很自然地去留意垃圾桶和街角是否有别人不要却很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眼力大概就是在这种长久留意下训练出来，所以总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物件。

创建“Stooping北京”后，罗二狗才开始“捡破烂”。他每周抽出两三天专门出去stooping，在家附近形成较为固定的路线，日常走在路上也会开始留意。他盯着的多是垃圾箱，或者店面门口和马路边看起来没人要的物件。北京五道营胡同里，二狗在垃圾桶上捡到一个古朴又很有设计感的首饰盒，可能来自胡同里的饰品店，整体完好、只有几道小裂缝。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满意的战利品。

这样的故事总让我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脑海中浮出一些画面，想象许多“宝藏”静静窝在某个街角，他们无声地呼叫“来捡我，来捡我”。对于漂亮物件有所执迷，同时也在期许街头“寻宝”的刺激和惊喜。

Stooping大体还是围绕日常活动的范围开展，出现什么与周边生活环境相关，老小区更可能出现老物件；能否捡到还关乎时间，晚上捡到概率更高，这时环卫工还没上班，也是丢弃垃圾的高峰期。我们似乎可以在垃圾桶中发现一切，也极有可能什么都没，捡得好物的前提是恰好的时间出现在恰好的地点。只能随缘。

“我更多的当作一个放松的方式，我去找，如果有的话肯定会带来额外的成就感或者是收获。如果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失落。”二狗已经放平了心态。

今年7月，听说距我步行十几分钟距离的蠡墅老街部分拆迁，我看过很多在拆迁老房中发现可爱老物件的视频，一个下午我决定过去碰碰运气。主街后面，我发现了一栋拆的只剩外墙框架的房子，或许因为外面一圈被围了起来，或许留意到周边有人活动，最后我没走近。

老房还在那，顶着一身的破洞，我走到门口，除了看到墙上挂着一副“群仙会”，只剩下地面一片破碎狼藉的木头、破布片。它可能已经被筛过无数次，我没找到什么东西，但这次探险行动于我而言更像跨越一个门槛、冲破一种障碍，以stooping的名义。

“捡的时候有心理负担吗？”我问了每一个人。

为什么想到问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捡破烂”这个说法或许已经形成了一些固有印象，甚至是贫穷、边缘等负面的联想，很多时候很难将此与年轻人联系起来。

武楷斯和二狗都回答没有，他们专注在事情本身，不太在意外界目光。武楷斯7年旧货生涯中，听到过很多不理解的声音，他一直不太在乎。

和武楷斯相熟的殷大新也是名旧物爱好者，生活在距离广州市区半小时车程的郊区。他日常看到有价值的物件也会去捡，但跟武楷斯心理不尽相同，“人多的时候有点过不了心里关，会看一下四周有没有人，没人再过去捡。但是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很好看的柜子，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过去，因为慢一秒可能就被别人捡走了。”

武楷斯曾提出一个让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观点：“有了stooping这个名号之后，一些有这个爱好的人就敢去做捡垃圾这件事。可能他之前心里面有这个想法，但不好意思，借着stooping的名号，大家等于有了一个理论支持。”我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尽管我冲破的心理障碍主要是社恐，但stooping确实成为一种行动的动力。

我想，当“捡破烂”这件事被赋名stooping时，它便成为一个被发起的活动，一种姿态，有具体内容、规则和理念。“stoop”英文原意包含名词的“门廊”和动词的“俯身”，言明了活动的最可能范围，也勾画了动作。有所行动，去“捡”或许才是关键。





大新在废墟。图：作者提供

二狗近来觉得“Stooping北京”的发展与他最初的预期不太一样。他发现大家更多把这当成交换闲置的平台，在小红书创建的几个群聊里，群友以闲置交换为主，其中少部分人往外送，大部分人想免费获取自己需要的。而他的初衷是希望大家更多走上街头，从自己身边发现这些遗弃之物。因为人群有限，每个人拥有的事物有限，如果走上街头，可能有更多空间、更多机会和更多收获。在他看来，有所行动是意义所在，也让stooping更容易被认知和接受。

现在二狗单独建了一个群，聚集对stooping本身感兴趣的朋友，已有200来人入群聊。“Mikiko在上海”也不再接受和发布闲置信息。

省钱、循环和价值再造

二狗在今年8月看到了“Mikiko在上海”，第二天他就创建了“Stooping北京”，这应该是国内第二个专门的stooping账号。武楷斯同样是看到上海账号后，在9月创建了“Stooping广州”，一个月后又创建“Stooping深圳”。武楷斯和二狗其实都是旧物爱好者，他们觉得stooping的理念与自身的兴趣和在做的事情很相合。

小红书上还有一个stooping苏州账号，创建者南征是互联网行业从业者，他知道stooping晚一些。他更关注的是二手闲置的循环，而不是对旧物有所爱好。

各个城市的发起者们初始的关注点可能不完全一样，但契合点在Stooping发起后的一句宣言中：“一个人

“每个人的垃圾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宝藏。”我们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述，比如“Stooping广州”说“甲之破烂，乙之瑰宝”，“Stooping宁波”说“君之断舍离，他之正所需”，但不管怎么变化，都在传达同一个意思，简洁、清晰，指向价值的再发现和流通循环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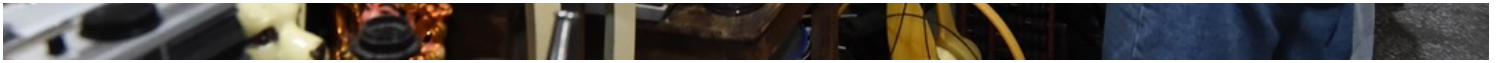
2015年，提前修满学分的武楷斯去美国流浪了两个月，他当过沙发客，在墨西哥边境游荡过，而这段旅行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繁荣的美国旧货文化，这是他与旧货结缘的起始。南征也在国外求过学。他们都留意到，国外二手商品整个市场环境更为成熟，有跳蚤市场、二手店铺、亚马逊电商和庭园甩卖等各种各样的商业交易模式，使用二手商品也已经是被认可和接受的生活方式。

回国后，武楷斯开始留意国内的旧货市场。彼时，58同城网站上有一些二手闲置的交易信息，但范围比较小，二手交易APP闲鱼刚刚推出，线下旧货市场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旧货或者闲置交易还是件新鲜事。

不过，近几年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消费理念也随之变化，作为更具性价比的渠道，二手闲置交易逐渐受到更多关注。

“年轻人可能比较穷。”和二狗讨论为什么stooping更受年轻人青睐时，二狗如是说。据他观察，关注“Stooping北京”的多是30岁以内的女性。年轻人更开放、更容易接受新鲜的理念，经济和消费理念的变化似乎也不能忽略。





2020年5月，中国重庆一个跳蚤市场。摄：Zhou Yi/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武楷斯、二狗、还有我，喜欢淘旧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省钱，用远低于全新品的价格买到心仪的物件是一种乐趣。stooping最早兴起在一线大城市，北漂、沪漂、深漂的年轻人们租房为主，很少会花费大成本购入家具，他们更追求性价比，二手闲置是个好选择。Stooping包括街头发现、闲置免费赠送以及交换，从交易向更降低成本的方向推动一步，甚至零成本，因此更容易吸引年轻人们。

一个有趣的发现，我所接触到的旧物爱好者通常都是从旧货市场起，总会进阶到街头和废墟“捡破烂”，似乎我们都在向着更本源、更丰富和零成本的方向靠拢。

武楷斯、二狗、还有我，喜欢淘旧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省钱，用远低于全新品的价格买到心仪的物件是一种乐趣。stooping最早兴起在一线大城市，北漂、沪漂、深漂的年轻人们租房为主，很少会花费大成本购入家具，他们更追求性价比，二手闲置是个好选择。Stooping包括街头发现、闲置免费赠送以及交换，从交易向更降低成本的方向推动一步，甚至零成本，因此更容易吸引年轻人们。

一个有趣的发现，我所接触到的旧物爱好者通常都是从旧货市场起，总会进阶到街头和废墟“捡破烂”，似乎我们都在向着更本源、更丰富和零成本的方向靠拢。

Stooping的意义当然不只是省钱。“废弃”与“宝藏”这一对比，是对物件价值的主观判断。一方面，被丢弃的“垃圾”可能没有损坏，只是不再被需要，大家关注stooping或闲置循环也在寻求符合自身需求的实用价值。如南征捡物的原则是“能用就用”。这其中也包括对品质的判断，大新曾在路边发现一个书架，是他喜欢的样式，但材质为现代颗粒板，更爱实木的他就没有捡回家。

有时，物件的实际应用还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二狗前段时间捡到了几个抽屉，捡的时候没有想好能用来做什么。他想过把抽屉立起来变成收纳柜，但带回家后发现高度正适合放在沙发下，既是储物空间，又防止落灰，阻止家里猫狗钻沙发。“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捡回来才知道哪里最适合他。”

如果说“能用就用”是物件价值的发现，旧物改造则是更深层面的价值挖掘。一把椅子只能做椅子吗？除了制造后被赋予的功能，其实一个物件有多种可能性，一把椅子可以成为墙上的置物架、可以成为床头柜，还可以成为纯粹的艺术品，最后的呈现只取决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旧物改造也是“捡破烂”的年轻人所热衷的。这或许是“物尽其用”的最高境界。

城市另一面与消逝的生活

殷大新站在废墟中，一手是旧物，一手是相机。跟大新聊完，当晚他给我发来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我似乎找到了自己与旧物相处的方式”，“与旧物相处”这个说法打动了。

我们可以通过影像、文字等方式记录生活，“物”却是最直接的载体，它们可能带着故事来，我们也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大新是名摄影师，4年前开始系统地收集旧物，他喜欢收集影像方面的内容，跟他的工作息息相关，还有包含童年记忆的物件，老照片、旧书、CD、磁带还有一些八九十年代的镜子、灯等日常生活用品。

在大新住的村子里，有一对老夫妇开了四十多年杂货铺。大新认识他们，是因为想买店里装糖果和零食的罐子，刚开始老夫妇不肯卖，他去的次数多了才松口。老夫妇退休关停店铺之前，送了大新一个零食柜，带有抽屉，可以放零钱，他们希望大新继续用它做经营。老夫妇当年知青下乡，返城后赶上个体经济兴起，开起杂货铺，那个零食柜是杂货铺的第一件家具。

大新没有用柜子收过钱，但物与人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收的旧物都让我有一些情感上的连接，或者是记忆的延伸。”



殷大新是名摄影师，4年前开始系统地收集旧物，他喜欢收集影像方面的内容，跟他的工作息息相关。图：作者提供

还没有成为职业摄影师时，大新很喜欢去老城区，边逛边拍。就是在这样的穿街走巷中，他看到很多废弃的房子，还有房子中被遗弃的不少好东西。他开始到拆迁老房中捡破烂，发掘出一个新的淘旧物渠道。

废墟是危险的。经常到废墟中搜捡的武楷斯被碎玻璃和木头上的钉子扎过脚，有一些拆迁房连楼梯都没有，他得爬梯子才能上去。但他在其中发现过漂亮的老家具，甚至是遗像，危险便显得不足为道。

废墟是荒芜的，是城市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一帧匆忙终结的场景，却保存下已消逝生活的一点余温。

武楷斯想了解一座城市时，去旧货市场。只要去过的人很容易理解这种说法。旧货市场永远琳琅满目，其中有我们熟悉的一部分过去，也有很多我们不熟悉、或根本想象不到的奇妙物件，像一个流动的博物馆。如武楷斯所说，旧物承载的不只是个人记忆，还在展示时代痕迹、城市历史与生活变迁。

如果运气好，武楷斯可以“拥有”一段历史。他曾在湖南淘到属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竹编茶叶罐和四把竹椅子，在景德镇旧货市场淘到瓷器烧窑工人的搭肩布和工作服，后来都在博物馆中见到一模一样的展品。旧物带他穿梭历史。

武楷斯的日常生活充满旧物，他吃饭的碗来自100多年前，他觉得老物件在设计、审美、功能等方方面面“什么都好”，更有独特的风格。旧物中，他尤为喜欢书籍、服饰还有家具。

他获取旧物的途径之一是上门处理遗物。每一间堆满物件的小屋，都让他看到一个人被浓缩的一生。旧物记载一个人的过往，既让人唏嘘，同时也治愈。武楷斯曾在旧货市场收到一大包信件，囊括了童年、少年、大学到工作各个阶段。发布在社交平台后，被信件原主人的同事看到，原主人联系到武楷斯，武楷斯视这为奇妙的缘分，把这份被误当作垃圾处理的信件免费送还原主人。“有很多他已故父亲写给他的信，同学写给他的信，等于帮他找回了他的很多经历。”

在我的收藏列表里，盒子一定占第一位，铁皮盒、木头盒，原来装糖果点心、装首饰、装樟脑球甚至装钱的小保险盒。盒子里有一个空间，空间让人产生想象，这大概是我喜欢盒子的原因。其实每收集一个旧物，我都想通过一些细节探究他们的历史。我在旧货市场收到的第一个盒子是民国时期装樟脑球的铁皮盒子，表面贴有“德国先灵洋行”字样。德国先灵后来被跨国药企拜耳收购，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一段偶然得知的历史，却恰巧与我所处的行业，与我的生活建立起隐秘的联系。

在所有的故事里，我们都在通过旧物建立起新的连接，与自我、与他者、与世界。



2007年11月，中国北京，小贩在潘家园跳蚤市场买卖旧物。摄：Claro Cortes IV/Reuters/达志影像

渐渐地不再满足收藏旧物，走向输出和表达。大新看到，有的旧物爱好者用旧物改造作品去展览，有的旧物生意做的风生水起，有的与自己工作结合。

大新属于最后一种人，他用相机记录旧物本身和旧物背后的故事，在他的小红书账号和微信公众号上已经发布了许多有关旧物、玩旧人物的视频，有旧货市场里的随机采访、有改造旧娃娃的纹身师、还有维修放映机的老师傅。

作为少数全职经营旧货生意的年轻人，武楷斯7年来最大的挣扎一直围绕“如何把捡垃圾变成能够养活自己的事。”卖总比淘更难。

卖给谁？怎么卖？在哪里卖？除了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时，他已经摸索出较为固定的模式：最基础的是旧物的租赁和出售，他会旧物进行修复、改造，拍好看的照片，写一段文案，研究分享物品的历史。目前，他在广州已经开了两家实体旧货店，店名叫“永续旧物”，加上仓库一共1000平左右空间，也有线上销售的渠道，包括微信朋友圈以及闲鱼和多抓鱼等二手平台，近三年的销售主要来自线上。其他的方式则包括场景布置、视频策划还有二手市集。

“这个路途其实挺漫长，我早就摸索出这套模式，也要不断去优化过程、积累经验。”武楷斯说。

“垃圾教育”的战场

南征和他的同事一口气创建了10个stooping账号，包括苏州、南京、杭州、合肥、天津、武汉等。在选择城市时，南征主要考量城市的人口基数，人口超过1000万的，并且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更多。

武楷斯和二狗都与我谈到过stooping更适合在哪些城市推广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会集中在一二线大城市中。这些城市年轻人更多、流动性大，搬家、租房会产生大量二手物品，形成闲置流通的场景，年轻人对二手的接受和包容程度也更高一些。目前，据我了解，同我一样得到小红书官方支持的stooping账号共有9个，北上广深、苏州、宁波、长沙、武汉和珠海，分布的城市确实体现出集中在一二线的特点。

事实上，武楷斯写过专门的文章讨论stooping在中国的发展，他认为需要扩大解释：中国有180万环卫工人，清洁效率非常高，值钱的废品很难在垃圾桶中停留超过半天，国外环卫工清扫大街的频率远低于国内，美国大概一周一次，在街上捡拾物品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再加上中国的废品价格高，专职废品回收可以上门带走二手和闲置物品，还会付原主人一部分费用，而在国外，请回收公司来清理废品，要为此付出一笔不菲的费用。



“街头捡垃圾，包含了更多的随机性和趣味性。但是这在国内比较难以实现。中西方国情不同，所以在中国 stooping 应该扩大到个人的二手闲置。”目前，Stooping 广州、Stooping 深圳还有 Stooping 北京，90% 是二手闲置物品的免费赠送。“其实是在源头上获取了 stooping 信息。”

“Stooping 苏州”创建在11月9号，截至目前，粉丝已经有841，增长速度不算特别快，768人入群聊。先行者们已经做好了前期的认知铺垫，很多粉丝在最初关注和留言时已经对 stooping 有了初步了解。在这个还比较小的样本中，我观察到也是有关闲置的交流居多。群聊里的闲置流动更频繁、更活跃。社群在很多时候都是闲置交流的主要场景。

不管是85后的我，还是90后、95后的其他发起人们，我们从小看到家庭对于旧物的回收和再利用，我们的一些城市中有早成规模的旧货市场，循环的理念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以家庭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stooping 其实不过是将这样的理念赋予仪式化和名目，再重新提炼、讲述与推动。二手闲置的循环和流通将会一直存在。热爱旧物的人群依然是小众的，但也在不断聚集，形成自己的影响力。这大概就是武楷斯所说的“垃圾教育”。

于我而言，stooping 逐渐成为我日常 Citywalk 中一项同步加载的任务。现在我的目标是苏州的老城区或者古镇，那里有一些拆迁的老房子，希望我能找到一些真正的老物件。如果找不到，也没关系，“捡破烂”本该是洒脱的体验。

应受访者要求，二狗为化名